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六年第二期 总第12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日本“迷失十年”前车可鉴 中国应警惕通缩陷阱
- 02 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下行压力？

聚焦中三角

- 07 湘公布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
- 08 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实施
- 09 澳区青委赴湘研习收获丰

改革探索

- 10 中国逆转国企改革方向
- 11 中国须跨越改革空转的陷阱
- 14 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回到过去与全面私有化都不可行

经济广角

- 16 中国承担全球经济治理
- 17 南京在港推现代服务业 引港资拓合作
- 19 中国经济呈现 L+N 形走势

科教文卫

- 21 航天探月量子通信智能驾舱齐亮相 “十二五”创新铸就“国之重器”
- 22 深非遗文化传承者“武”进校园
- 23 中国医改面临挑战：如何让医院患者都受益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 24 安徽百万贫困户年内脱困 400 万人建档立卡“一对一”精准扶贫
- 25 科技创新开辟粮食产业新路径
- 27 丽江展开扶贫攻坚战

社会观察

- 29 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
- 31 城镇家庭幸福感高于农村 环境品质成衡量标尺
- 32 别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扼住中国创新

综合治理

- 34 粤环保治理引进社会力量
- 34 中国反腐运动扩大范围

环球视野

- 36 结构改革是提高亚洲潜在增长率的关键
- 37 脆弱的台湾公民社会

学术前沿

- 39 解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42 解读“高考改革”

讯息快递

孝感图书馆

日本“迷失十年”前车可鉴 中国应警惕通缩陷阱

屈宏斌 香港《大公报》2016年6月1日

随着经济逐步企稳，市场焦点也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转变为关注宏观调控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向。尤其最近刊登的“权威人士”访谈中，对供给侧改革的重视以及对高杠杆的担忧，更是加剧外界对政策收紧的猜测。我们对此并不认同，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旧明显，此时言及退出政策宽松无疑为时过早。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邻国日本经历的长达十多年之久的通缩，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90年代初，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日本国内价格迅速回落。GDP平减指数在1993年底跌到1%以下，并于1994年底跌成负数，并在随后近二十年（77个季度）中一共仅有八个季度为正。PPI在90年代初期也一度连续六十五个月保持在负数区间。经济增长也在十年多内持续低迷，被称为“迷失十年”。面对彼时的挑战，日本政府并没有很好的应对。

错误思潮一叶障目

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要正视通缩风险，抵御错误思潮，分清主次矛盾。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滑，日本政府却未给予足够重视。在亟需需求调节的时期，反对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路，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的论调成为了主流观点。随后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通胀指标已明确指向通缩，但国内仍认为根源在于各种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化后进口价格降低，监管约束过多，国企僵化等。至90年代后期，人们终于认识到经济确实有通缩。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如Krugman和Bernanke等明确指出了日本经济亟需采取提振总需求的措施。

综上所述，在通缩初现时，错误思潮使得结构性改革，如财政整顿、放松监管、加速私有化等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重心。逆周期调节措施的缺位，让日本错过抵御通缩的最佳时机。随后当政府开始采取货币、财政宽松措施，通缩已然根深蒂固，因此那些逆周期调节措施并没有立竿见影。这又促进了“逆周期调节无效”说在日本盛行，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

供需改革不可偏废

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中国经济增速自三年前就开始明显放缓，而多个通胀指标亦齐步走低，企业产能利用低下。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等缓慢渐进的趋势来说，总需求的下降更加剧烈，这也是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在悲观预期下，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跌相互自我强化，或使经济面临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风险。

诚然，眼下部分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拒绝为整体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让没有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源闲置。更何况，货币、财政宽松等拉动总需求恢复的政策，可为供给侧去产能、去库存等改革提供必要的融资、财力支持。毕竟，去产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安置转岗工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刺激需求恢复后，名义增长的回升也有助于帮助企业盈利恢复，进而降低债务负担。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多管齐下，从供给、需求侧同时着手，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政策支持需要及时

其次，货币、财政政策要及时果断，相互配合。回顾当年，在股市开始暴跌一年多之后，日本政府才开始启动首轮货币宽松。尽管政策利率降低到零的水平，但由于通缩已然深重，实际利率仍然为正，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财政刺激同样于1993年才开始启动，同样其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总体来说，日本政府的应对过于迟缓且力度不足，而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也较差。从1990年中期之后的数十年内，货币、财政政策总是一方宽松、一方收紧，从未协调同步过。因此对需求的提振效果有限。

再次，在经济的复苏态势没有完全确立之前，切忌过早退出宽松。在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初见成效之后，政府又过早停止财政扩张，并于1997至1998年开展财政整顿。同样，由于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流入僵化低消的国有企业，日本央行在2000年8月份再度收紧货币政策，即便当时核心通胀率正在减弱，而其国内产出缺口仍位于GDP1.1%左右。这些举措使得好不容易略有起色经济再度陷入低迷。

日本90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因政策失误而延误。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但本质上面对经济放缓和通缩风险时，恰当的政策调控原则应对是同样的。以史为鉴，在中国面临艰巨的抗通缩之战时，必须从供给、需求两侧同时入手，并配合多种稳增长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尽快促进需求恢复，长期内优化资源配置，防止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下滑。

中国经济如何应对下行压力？

任蕙兰 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6月14日

纵观2015，中国经济亮点纷呈。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划定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航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提出，创新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彰显中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潜力；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重开，“城镇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这些努力都说明了一件事，“转型”是中国经济第一关键字。

调结构“视窗期”

2014年5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同年10月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对经济“新常态”做了系统阐述。纵观2015年中国经济，渐别“唯GDP论”，走进“新常态”成为各种经济变化的一抹底色。

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9%。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从“9时代”下滑到7以下，但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痛感”并不强烈。而在过去30多年来，经济一跌到8以下，马上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就业，以及伴随就业率下滑产生的社会安定问题，财政收入也会下滑，所有需要财政补贴来发展的行业，特别是农业，就会陷入困境。

而这次经济增速下滑到7以下，就业指标和财政指标却没有跟着变糟。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看来，这就是一个新常态，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状态。

“反过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于整个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新常态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新政策。经济要转型，认识和应对也要转型，这已经慢慢形成共识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过分析，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说明原来的投资驱动经济模式在“新常态”下行不通了。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预防当时经济出现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4万亿的理念是继承凯恩斯主义思想，在经济萧条时，只有靠政府投资产生乘数效应，才能减缓经济下滑的态势，实现经济复苏。但是实践的结果表明，刺激政策最后造成了产能过剩，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务中，化解产能过剩居首。

产能过剩的局面让人们醒悟，不是政府任意投资，都能产生乘数效应来拉动经济，所以“新常态”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划定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也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视窗期”。转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以前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转成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企业起步标准很低，要素成本也很低，正好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角色功能加入世界经济中。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制造能力强、模仿能力强、人很勤奋等等，所有的优势在过去几十年充分发挥，所以中国经济才会有多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际环境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而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是，所有以前的优势基本上都没了，人口红利减退，各种要素成本提高。反过来，世界经济危机，外部市场不需要这么多产品了。整个世界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大的结构转变。传统产业逐渐失去市场，和互联网以及新的技术革命有关的新兴产业在起步。2008年4万亿投资注入的是传统产业，结果产能过剩，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中国经济到了转折点，中国要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应该要从跟随走向引领。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供给端发力，“双创”是关键

以前投资下去，劳动力配上，经济就增长了，现在仅仅靠投资拉不动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品质、对创意、对供给新型化都有了不低的要求。

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品质和效率。早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就首次提出供给端改革。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供给端，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供给端发力，这是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热词，也是“新常态”下应对中国经济下行放出的大招。以前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而消费拉动经济比较难，因为消费是一个常态，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但是在转折期，会出现供给引领消费的典型状态。

什么叫供给引领消费？就是通过发明一种新产品，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大消费空间。举个例子，手机智能化以后，人们发现很多手机上的消费以前是没有的。手机不止承担通话功能，还是一个交友平台、支付平台。人们在手机上的消费会大幅提高，这种消费在没有智慧手机的时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供给端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会激发以前没有的新消费，这种消费往往是爆发性的、大面积产生的，对刺激经济有很大作用。

把美国经济带出滞胀困境的前总统雷根，就是供给学派的坚定信奉者。他在任时，美国经济陷入痛苦的滞胀，雷根听取了供给学派的一个建议，通过刺激供给带动消费需求，而刺激供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尤其是给创新企业减税，让它们用很低的成本创业。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所阐述的内容。美国矽谷等大型创新创业园区都是在雷根时代缔造的，雷根的供给刺激政策带动了美国的资讯革命。

而中国的供给端发力靠什么？答案也是创新。当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平台搭建好以后，相信新的供给模式会不断刺激新的消费。

2015年，中国进入创业的“黄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已成为中国经济活力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双创”。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真正将大众创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来践行。

“创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表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这一年，“创客”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创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口中的高频辞汇。

创新需要市场和政府两个引擎，一方面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一方面继续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改革先行财税、投资、金融等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今年，中央不断出台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档，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目标任务情况下继续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先照后证”，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万户。

不断扩容的自贸区也已经成为简政放权、深化改革的桥头堡。2015年3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天津、广东和福建三大自贸区以及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决定正式实施。

中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在“新常态”下企稳？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决于新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此消彼长。如果在经济低潮的时候，通过鼓励创新刺激供给，带动消费，就能在“十三五”期间，把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给止住。

“如果新产业上来快一点，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快一点，就能把旧产业下去的部分弥补上，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增速下滑就会停止。”石良平表示。现在所宣导的“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有这些政策导向，就是要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拉动经济

12月20日至21日，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4年的55%。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城镇化是带

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城镇化以后，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人在农村一般是享受不到高品质的服务的，也没有这种需求，在城镇就会享受到，就会带动消费。”石良平说。

以前中国比较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小城市很安静休闲，管理也不复杂，人口大概在20万—30万，10年前大家认为这样的城市规模最好，也没有什么“城市病”。现在发现不对，城市人口不足100万，很多产业发展不起来，特别是大型服务业，比如大型超市、娱乐中心等。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购物中心不愿意进驻，因为一进去就亏本。

所以现在大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今后不能随意地让各省自己任意建造小城市，结果都成了空城，现在房地产萧条的都是小城市，必须要从全国角度，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大中型城市。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出现繁荣景象。

就像中国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大城市也是连成片的。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一路过去，都是人口100万以上城市连成片。中间有一些农村，主要提供休闲度假、生态有机农业的功能。城市集聚后，人多了，机会也就多了，人口要相对集中才有发展。

在以前的产业结构下，中国有很多生产型、制造型的工业城市，人口不需要很多，现在资讯化以后，资讯对人口聚集是有要求的，因为铺设网路是有成本的。平台越大，能实现的功能就越多，交友、支付都能运作起来。

另一方面，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就能留出更多青山绿水保护起来。因为人会制造污染，集中处理比分散处理容易得多。如果每一块土地都开发为小城市，把环境都破坏了，只会加大国土整治的成本。

“互联网+”引发想像

今年3月，李克强这样回答一个记者关于“互联网+”的提问：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2015年，“互联网+”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更彰显中国对互联网事业的重视。

一年之中，各项政策相继出台。5月，国务院宣布未来3年将投资1.13万亿元用于网路建设；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随后，各地也陆续推出地方版的行动方案，并积极与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

“互联网+”是什么？据媒体报导，“互联网+”理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马”（马明哲、马化腾和马云）在众安保险开业仪式上的发言。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能力，或者是

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

“互联网+”行动计划又是什么？

雷军在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的名词解释中看到了具体内容，他用手机逐字逐句把这些内容发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资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打个比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让很多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互联网也会像电一样，作为一种生产力工具，给每个行业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互联网将不再是一个行业，网路将深入所有行业。

对于“互联网+”改变行业目前所面临的难点，石良平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大部分是在消费领域，以及交友和支付方面。现在互联网渗透的一个难点，在于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一个原因是，搞互联网的人对制造业是很不熟悉的，制造业千差万别，不像消费是通用的，它是专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形成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所有平台的分割，各个平台难以联通。这都是大机器时代产物。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界。我们现在形成的条线管理模式，正好是跨界的障碍。

如果“互联网+”在十三五期间有所突破，相信中国经济媲美德国“工业 4.0”将不是梦想。

聚集中三角

湘公布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

周芷行《香港商报》2016年6月7日

3日，湖南省环保厅对外发布了2015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结果，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上市公司、日常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实际评价企业1220家。

公布 86 家环境不良企业名单

据湖南省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谢立介绍，2015年度的企业环境评价整个过程中坚持公众参与，评价过程经企业自查自报、省市环保部门逐级审查、省环保厅公众网公示等程序评定，其中环境诚信企业30家、环境合格企业964家、环境风险企业

140家、环境不良企业86家。

值得一提的是，NGO在结果公示阶段，对共计96家企业信息提出不同意见后，湖南省环保厅将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沅江市金太阳纸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信用等级下调为“环境风险”。

据了解，湖南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将纳入信用评价体系，作为开展企业整体信用评级、绿色信贷、上市核查、再融资申请核定等工作的参与依据。对环境诚信企业采取激励措施，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对环境风险和不良企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大监察监测频次，对拒不整改或治理无望的企业将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关闭。

谢立在接受记者时表示，环境的保护与公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湖南十四个地州市的老百姓大部分都饮用地表水，经检测有29个水源地是达标的，5月18日对湘江两岸水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有5种重金属的浓度都在一类水质范围，根据检测结果和湘江水质的状况，目前湘江的水是可以放心饮用的。

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实施

俞鲲 香港《文汇报》2016年6月18日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中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小组同意，国家发改委近日批复了《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湖北省将按照批复，把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放在首位，探索中国中部地区也是内地唯一的林区政府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肖安民表示，2014年8月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式牵头启动首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选定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9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时间为3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筹）已于青海西宁挂牌，湖北神农架则是第二家经过中央批复试点方案的国家公园试点区。

实现统一高效管理

据悉，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神农架林区总面积35.97%。湖北省编办副主任彭超指，试点区将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大区域进行深度融合，增强保护地的联通性、协调性、完整性，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他同时透露，从管理体制上，湖北省将建立由湖北省神农架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组建的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重点解决试点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各类保护地交叉重叠的

碎片化问题，形成统一、高效、规范的管理体制。

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黄德华表示，神农架林区是内地唯一一个以“林区”命名的省辖行政区，全区森林覆盖率达90%，自然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高达96%，已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并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神农架国家公园以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资源为主体，未来将实行分区的网格化精细管理。更有相关人士透露，神农架林区下月有望入选“世界自然遗产”。

澳区青委赴湘研习收获丰

《澳门日报》2016年6月30日

六月十七至十九日，全国省市澳区青联委员在团长庄玲玲的带领下，在湖南省长沙市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澳区青联委员国情研习班。

活动由中央驻澳联络办青年工作部组织，成员共廿二人，由中央驻澳联络办青年工作部处长洪波担任随团顾问，全国青联委员、澳门妇联秘书长庄玲玲担任团长，黑龙江省青联常委、宁夏青联委员及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常委张照珩担任副团长，其余成员分别来自本澳各社团的主要骨干，中央驻澳联络办青年工作部助理周权亦随团参加。

体验绿色城市魅力

是次活动主要考察参观湖南省近年来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和经验，以及作为千年建城历史的文化内涵。主要在长沙进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了位于长沙橘子洲头，全球首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成果展示基地”的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展示馆，了解湖南省近年在践行国家战略中顶层设计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型概念的重要成果，对未来推动其他地区“两型社会”提供良好示范；考察长沙市“三馆一厅”的长沙市规划馆，了解其“山水洲城”的绿色城市规划理念，体现长沙在历史、人文和发展的平衡；考察湖南省“青年之声”综合服务平台，了解其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团委统筹联建的综合枢纽青年服务平台，提供线上线下的特色服务，为广大青少年在学习、成长和工作上提供个性化和公益性的支援和服务。

了解创新创业成果

另外重点参观国家科技部位于国防科技大学内的重大项目，全球首台集高性能科学与工程计算和大规模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体现祖国在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方面的重大成果。同时参观在北宋建成并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体验其传承我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参观创新型企业“御家汇”，了解其在创业创

新年代下，如何把握互联网+优势打造出以快速消费品的自主品牌的历程。考察参观行程紧凑，成员收获丰富。

研习班成员亦与湖南省海联会和省青联约三十名成员进行交流联欢活动，湖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谭平，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青联主席汤立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潇等出席，双方成员深入交流，加强了澳湘青年之间的认识和互动，并合唱歌曲，气氛欢愉。活动于日前结束，成员乘坐高铁返澳。

改革探索

中国逆转国企改革方向

韩碧如 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6月15日

中国共产党正采取行动收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逆转了按照西方企业的模式重塑这些企业的近20年尝试。

官方媒体文章和党的文件宣传这项努力之际，对公民社会、军方和媒体的控制也在收紧。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在党内巩固权力。

赋予每一家国有企业内部党委更大权力的新方向，破坏了之前的努力，即建立董事会，推动其根据市场状况、盈利能力和硬性预算约束做出决策。

此举也与去年9月出台的政策（使国企更有效率、以市场为导向）明显抵触。昨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建议中国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帮助重组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这个建议与中国政府今年春季发起的承认并应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努力是一致的。

“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在有影响力的党刊《求是》(Seeking Truth)撰文写道，“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经理班子作出决定。”

“这实际上是回到了改革前的时代，”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他提出，此举违反了中国的《公司法》。

中国国有部门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私营企业以及经历了之前几十年的战火而幸存下来的基础设施都按照苏联模式被国有化。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工厂、炼钢厂、炼油厂和发电厂纷纷从主管它们的部委剥离出来，而多数面向消费者的国有集团被私有化或者破产。

上世纪90年代末推行改革、淘汰效率最低且负债累累的国有集团后，“支柱产业”剩下的国有企业被重组为国有冠军企业。这些企业试图在形象和行动上模仿跨

国公司竞争对手，启用公司标识，在北京建设神气的新总部，并在境内外证交所上市。

习近平发起的持续已三年多的反腐败斗争重创了国家级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中石油(PetroChina)。曾支持习近平的政治对手薄熙来、现已失势的周永康曾经主管石油和政法委部门。他曾在国有石油和资源系统内部编织一个亲信网络，利用这些企业的财务和国际影响力。

几乎所有国企高管都是党员。像监管国企高管的政府官员一样，国企高管在企业管理层的地位有对应的行政级别。最大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党内级别也很高。

中国的国企部门理论上是盈利的，但2012年由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最强大的国家、省和地方国有企业在2001年至2009年亏损，它们报告的利润被获得的补贴抵消。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北京方面实行刺激计划期间，国有企业背上大量债务。

左派批评者认为，中国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使工人们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在中国被称为“铁饭碗”。

尽管如此，国有企业继续推进国家的利益。他们弥补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为减少失业坚持不裁员，并在海外投射中国实力。

中国须跨越改革空转的陷阱

颜柏崎 香港《镜报月刊》2016年6月

对中共高层来说，今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运行可谓开门红，表现令人欣慰，在经历了执政三年多来一直被经济下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折磨后，终于松一口气。4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季度宏观经济资料，尽管GDP增速继续下滑至6.7%，创下近28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但由于包括房地产、进出口以及投资等数据的回暖，标志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些重要指标出现反弹迹象，权威部门据此做出了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发出筑底的积极信号的乐观评价。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经济一季度的很多宏观指针的确超过预期的数字，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比今年1至2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807亿元，同比增长4.8%，开始由负转正；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反弹，同比名义增长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5.2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28281万平方米，增长19.2%；1至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大增33.1%，商品房销售额增长54.1%，增速提高10.5个百分点；进出口下滑趋势趋缓，其中3月份进出口出现了

8.6%的增长，出口大涨18.7%。这一系列转好的数据似乎预示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持续下行的轨道。而在此之前，去年底至今年初频频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负面预测的一些国际机构突然姿态反转，纷纷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做出乐观展望，将中国经济增速的预判由下向上调整。

对经济判断过于乐观无益

在统计数字刚刚出炉之际，国务院领导就紧急召集全国若干个有区域代表性的省市负责人到京开会，了解这些省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以印证经济向好趋势的出现，并做出努力保持经济向好势头的诸项部署。然而有关人士提醒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估计固然不可取，但对已长达6年增速下降的中国经济作过于乐观的判断也是无益的。应该看到当下中国经济走出一波上升行情，并非是对扭转中国经济下行趋势起根本性作用的诸多改革举措得到真正落实，并起了实质性作用，更大程度上既有国内短期刺激政策实施的原因，例如今年前一二个月的信贷及货币的扩张，也有全球经济的短期反弹式波动的某些影响，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等，而这些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由下向上的反转。

有关分析人士指出，投资反弹最主要的还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刺激政策的结果，而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具有持续性尚难预料，目前的资料反弹仍然是过去刺激性老路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新旧动力的转换、结构的调整 and 产业的升级问题，以及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解决的，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下而上反转的根本动力，但这在短时间内是不能做到的。

四大新问题风险不断凸显

由此可见，不可对眼下出现的经济反弹现象作过高评价，因为这种反弹缺少根本性变革和新动力产生的可靠基础。反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些指标反弹的同时，有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也在不断凸显，一是去产能和解决僵尸企业的重大工程刚刚开始，由此引发的包括企业债务违约、银行不良贷款以及员工的安置问题尚未破题；二是在房地产投资反弹的同时，一线城市房价的疯涨偏离了今年房地产去库存的主题，房价疯涨的背后是各种加杠杆行为，暴涨可能导致的暴跌问题不得不防；三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特别是铁矿石价格的反弹，国内钢材价格开始上涨，在一些地方本来决定关停的企业有可能死灰复燃；四是作为经济风向标的民间投资一季度增速只有5.8%，增速远远低于投资的整体增速，1至3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只有5.7%，比去年同期降低3.0个百分点。因此在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启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主题还远远没有破题的情况下，切不可因为数据的短期反弹而轻言见底盲目乐观。

与此看法相接近，有一些接近高层的人士提出，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全面改革有

重新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的危险。近两年多来，改革自上而下的压力持续加大，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接连出台，但是改革落地的状况却很不理想，改革举措取得预期成果的更是少见。这次改革是在体制内由党政干部为主导并由他们负责实施和落实，然而他们或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或是因对强力反腐不满，或是因为缺少落实改革举措的能力及水平，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能作为，对贯彻落实改革举措虚应故事，让许多改革举措躺在文件里、留在会议上、停在嘴巴上。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真正可以对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产生积极作用的诸多改革并没有派上用场，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等等。特别是在供给侧改革中最具关键作用的去产能这一环节上，因其操作难度最大更是进展缓慢。这次经济指标的反弹很可能会减少和弱化改革的压力，加剧改革空转的状态。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要义

实际上今年初以来经济运行上出现反弹，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政策重走了一段投资刺激的老路，1至2月期间悄悄对信贷及货币作了大幅度的松动。尽管这是一种在经济下行压力无法缓解、经济社会及政治环境愈加吃紧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并不意味着执政高层会放弃反投资刺激的改革意向，但是这个选择毕竟是在诸多改革举措没有落实情况作出的，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相抗拒的，所以它对推进改革所产生的负作用很大。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要义，就是从政府拉动需求，转到供给侧的企业提高效率，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侧的政府转向供给侧的企业，让企业特别是众多的民营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权力和垄断性国企的作用越来越强大。

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重新回到国退民进的方向和路径上去，供给侧效率的提高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没有止境无极限的，而这都取决于政府主导退出的范围和垄断性国企减少的幅度有多大，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多强，取决于司法改革能否为众多企业的研发投入及创新活动提供更为有效的产权保护等等。

而这一切不是重走政府主导、国企垄断的投资拉动和刺激的老路可以做到可以兼顾的，反而是会被这条老路所断送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务之急恐怕不应是恋栈老路来保持经济向好势头，而是尽快调整和改变推进改革的方式，克服重集权而轻限权分权放权、重体制内轻体制外等偏颇与缺陷，跨越因不作为造成改革空转的陷阱，真正让全面深化改革的诸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值得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重申一个决心，坚决将简政放权、减化审批的路子走到底，坚决从大国企入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坚决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作用，与这三个坚决相呼应相配合的改革举措将会陆续出台，供给侧改革的步伐有望加快，而5月开始实施的较大规模的减税行动则会给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回到过去与全面私有化都不可行

郑永年 香港 凤凰网 2016年6月3日

国企改革不仅可以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生成，也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很显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很多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反过来还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产生造成巨大的冲击。

国企为什么遭到社会的抱怨呢？

首先是国企开始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时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肆扩张，其触角马上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哪里可以赚钱，哪里就会有国企。结果，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着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也因为国企都是大型的，它们空间的扩张表明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如此，国企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国企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中国国企的“走出去”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并且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种“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很多国企“走出去”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很难使人相信它们还是国有的。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代表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经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往往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足以将国企变成小集团的独立王国。简单地说，国企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而和社会甚至是政府无关。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曾经社会上的一些精英群体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进入国企，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国企内部的隐性福利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是国企发生亏损，最后还是会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国企。

即使是在“盈利”问题上，公众也并不相信国企真的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而获利的，更多的人相信国企是通过垄断，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来聚集财富。这种聚集财富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国企分配财富的方式更是缺少公众的监督。也同样为社会所抨击的是国企越来越具有封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流动性表明开放性的程度。一个组织流动性越强，开放性就越高。但国企已经在很多方面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状态。这尤其表现在员工招收方面。很多国企招收员工都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等关系）来进行，很难说是人才。当通过关系进入国企而才能又显得平庸的员工能够获得巨额经济好处的时候，那些被排挤在外面的社会成员显然要表示不满。所以可以说，国企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腐败透顶、任人唯亲、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象征。

国企的出路在哪里？一些人开始谴责改革，开始否认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企改革。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和90年代开始的改革有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单纯地谴责改革，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企的改革。就是说，问题并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谴责改革的人想法很简单，就是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模式已经破产，没有人相信回到那个模式能够解决国企问题。也有些人主张全面的私有化。但私有化不仅没有政策上的可行性，而且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在苏联和东欧的国企转型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过去和全面私有化这两种选择都不具有现实性。西方经济经历过几次大危机，政府往往找不到有效应对方式，缺少经济手段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在中国，国企经常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国企的存在还可继续起到防御和应付重大经济危机的作用。但首先需要保障国企本身不会有重大经济违纪行为，这就需要深化国企的改革。

实际上，国企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首先是进一步的企业化。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企业化在90年代只走了一步，即法人化，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现在国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业家。管理者还具有行政级别，这种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国企的途径，也是国企行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级别必须去除，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非政治人物。而政府可以发展出其他的手段来管理国企。

其次，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这是原初的设想，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国企要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没有边界，国企就会到处扩张。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些年央企毫无边界的大扩张给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央土”的感觉，这就出现了无穷的问题。所以用法律或

其他手段为央企行为设限总是必要的。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其垄断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国企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互相竞争。国企之间有了竞争，就会有进步。现在国企所面临的非竞争性的、可以对市场进行分割和垄断的环境，最终会导致国企走向没落。国企要保持开放性。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越是没有人，国企越是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毫无关系。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国企不能再继续成为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而应当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机制。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完整的制度性保障，透明度很高。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监督这个部门，也可以用议会对这个部门的运作进行监督和规制。不管怎么说，公共部门必须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没有这个环节，国企就很难培养出其社会责任来。没有社会责任，这个部门就会成为社会抱怨的对象。

经济广角

中国承担全球经济治理

石建勋 香港《大公报》2016年6月14日

2016年G20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主办G20峰会，标志着全球市场定位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筹办本次峰会，中国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低迷，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更趋分化，需要G20发挥引领作用，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注入新动力。

中国把今年的G20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正是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创新驱动潜力巨大、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亟待完善的“世情”，希望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四个重点领域能够达成G20有价值、有执行力的共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热切期待。

中国G20向峰会提出的主题包含“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单词，这不仅是在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更是针对当前世界急需，全球经济增长新困境、保证各国承诺的执行力，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更多以接受既有规则为主，扮演的是一个“好学生”的角色。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继续学习的同时，开始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努力在全球经济制度建设中作出中国贡献。

这既是深化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助于打破少数国家对全球经济法律规则的“垄断”，使规则向更为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国际角色日益突出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主动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义务，在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完善法律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后，中国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同时积极寻求区域合作法制的完善。中国牵头推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顺利结束了第四轮谈判，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在亚太地区降低贸易壁垒的协定。

在平衡国际金融秩序并推动其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积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危机救助、货币合作、金融稳定安排和维护汇率稳定等诸方面，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满足国际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提供公共品，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设立丝路基金、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放眼“十三五”，中国将更加深深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世界也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促进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保障，必然会赢得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南京在港推现代服务业 引港资拓合作

香港《文汇报》2016年6月1日

近年来，服务业日益成为江苏省南京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服务外包产业、金融保险业、科技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产业、旅游业、会展业、商贸流通业等现代服务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突出。6月1日，南京市市

长缪瑞林携团赴港举行南京市现代服务业推介会。

支撑作用明显强化

从2011年到2015年，南京市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稳定在50%以上，并持续上升，年均增速达11.6%，总量实现了五年翻番。五年来，在全市经济中，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从50.4%提升到了61.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从45.6%提升到了76.6%，服务业在产业税收中占比从39.3%提升到了45.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从50.6%提升到了58.7%。

目前，南京现代服务业中规模最大的产业是金融业，总量达到了1,122.23亿元(人民币，下同)，占比达20%。2015年末，南京金融业总资产突破5万亿元。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和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年末共有境内外上市企业77家，共有96家企业挂牌或者获准挂牌新“三板”。

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研发两大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15%。2015年，全市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4,091亿元，已有30家世界500强软件企业和36家中国软件百强企业在南京落户，全市涉软从业人员总数达64.6万人。全年签订各类输出技术合同25,351项，合同成交总额198.33亿元，增长10.1%。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产业作为南京市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增加值达59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6.1%。法律服务、会计审计服务等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2%。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成效显著，电子商务交易额持续保持25%以上增速，总量8,715亿元，快递物流业务总量达到50,251.9万件，年度增长77%；焦点科技、途牛、苏宁易购等一批企业跻身并保持全国相应产业领先行列。

农村电商亦快速发展，农村家电O2O平台汇通达完成5亿元A轮融资，目前已在江苏、浙江、安徽等七个省份拥有150多个平台。服务外包执行额总量达到约120亿美元，年度平均增速超过20%，在内地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民生类服务业逐步完善，养老服务、家庭服务、健康服务等产业功能建设不断提升，全市养老平台服务规模达到240万人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推进，在服务业增加值中比重超过48%。

产业功能全面提升

作为商贸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南京的商贸流通功能进一步提升，201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90亿元，是2010年的两倍。物流增加值五年年均增长超过10%，港口货物吞吐量稳定保持在2亿吨以上，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80万标箱，基本实现了五年翻番。

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年度旅游总收入达1,690亿元，2015年接待旅游

总人次首次突破一亿人次，分别达到五年前的1.8倍和1.6倍。全年举办大中型展览会议2,660个，展览总面积259万平方米，分别达到“十二五”末的2倍和3倍。枢纽型经济建设加快推进，空港枢纽经济区已获批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海港枢纽经济区港区和疏港公路建设加快推进，高铁经济区南京南站区域建设不断完善。

中国经济呈现L+N形走势

王春新 香港《大公报》2016年6月27日

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并呈现L+N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L形，即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持续回落后，近期开始以平稳速度横向滑行；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呈现N形，即结构转型和提升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尚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结构调整的压力仍大，出现反覆波动的问题需要正视。

经济增长平稳现L形走势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出现L形的增长走势，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需求总体上维持平稳，但拉动内需增长的力量已由投资向消费倾斜。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亮点，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动力有所加强。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略低于四月份的10.1%和第一季度的10.3%，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零售量增长9.7%，比四月份高出0.4个百分点，与第一季度持平。值得注意的是，五月份市场零售名义增速略降还受到五月份节假日比四月减少的影响，据粗略估算，这一因素影响零售名义增幅至少有0.5个百分点。如果综合考虑价格和节假日这两个因素，五月份消费市场的总体表现要比四月份为佳，甚至好过第一季度，这就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了支撑。

投资需求则出现较大幅度放缓。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仅增长9.6%，比一至四月回落0.9个百分点，更比第一季度回落1.1个百分点，也是多年来投资增速头一次降至单位数。从产业看，三次产业投资增速全部下跌，其中第二产业增速大幅下挫1.5个百分点，拉低全部投资增长0.6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降速的三分之二，主要是受产能过剩矛盾仍然突出、市场需求不足和企业投资意愿下滑的影响，可见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去产能对投资的影响正在加大。从地区看，除了东部地区投资增速略有加快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增速全部回落，尤其是东北地区投资收缩三成，显示该地区经济正处在衰退当中。

尽管目前消费和投资的表现背道而驰，且投资增速降幅大于消费升幅，但由于目前中国消费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差不多是投资的两倍，综合计算，内

部需求仍可维持今年以来的平稳走势，这也是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还能保持6.0%增长、增速与四月份持平的原因所在。

结构调整加快呈N形变化

二是外部需求开始止跌回稳。进出口贸易大调整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因之一，近期似乎有止跌回稳迹象。据海关统计，虽然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仍下跌3.2%，但比去年全年大跌7.0%已有所改善，其中首季仍减少5.9%，但四月份只微跌0.3%，五月份恢复1.2%的正增长，呈现逐月好转的势头。与此同时，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0.8%，与当月出口额上升1.2%的走势一致，说明这一轮由外部需求不足和加工贸易转型引发的外贸调整已度过最困难时期。预计第二季度外贸进口有机会止跌回升，这对经济平稳增长有正面作用。在经济增速出现L形变动的同时，结构调整和提升的步伐则不断加快，新增长动能有所加强，并呈现N形变化的特征。从供给看，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今年首季这两大高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4.5%，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五月份高技术产业同比劲增11.5%，增速比四月份加快1.8个百分点，更比首季加快2.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5%，较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也较首季加快1个百分点。在高技术产业中，五月份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分别劲增12.2%、28.3%、12.5%和27.5%，增速均大大高于全部工业；采矿和高耗能等传统产业增速则继续下滑，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3%，为近年来首次整体下降。这一供给结构变化完全符合“十三五”规划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大方向。

从消费看，网上零售、升级型乘用车和与消费升级有关的休闲娱乐类商品销售增速加快，说明新业态和升级类的新产品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从投资看，高技术产业、工业技术改造和科教文卫等服务业投资分别劲增13.6-17.3%，高耗能制造业投资则保持跌势，为未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但也要看到，结构调整也并非一帆风顺，目前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仍很艰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可忽视，如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每况愈下，今年首季民间投资只增加5.7%，升幅比去年同期急降7.8个百分点，一至五月民间投资仅增长3.2%，增速比首季再回落2.5个百分点。若以单月计，四至五月份民间投资实际上已进入负增长。由于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六成以上，其增速大降严重影响整体投资增长；由于民间投资下滑与经营成本上升、融资困境难解和投资机会不足等关键性因素有关，未来如何稳住民间投资实是一大挑战。又如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回升是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近期随着各中心城市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未来房地产投资不免受到压抑。

未来将维持稳中有进态势

总体而言，由于目前内部需求基本保持平稳，加上进出口贸易开始止跌回升，总体经济呈现出增速靠稳、结构提升的走势。这一走势基本上是良性的，经济增长现L形走势为结构调整提供了稳定环境，而结构调整呈N形走势，既拉动经济增长，也因加快去产能、去杠杆使经济不时面对下行压力。预计未来L+N形的走势将维持下去，第二季GDP将保持与首季相当的增长水平，全年有机会实现6.5-7.0%增长目标。

从中长期看，随着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等多项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进一步显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内含，未来五年中国将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准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争取在基础研究、运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运用，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到2020年R&D（研究开发）占GDP比重将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有望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实施创新驱动和突出抓好供给侧改革，将做大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促进中国经济沿着“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新常态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以建设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20大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释放出最大的内需潜力；“一带一路”建设也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商贸、相互投资和产能合作，从而带来更多的外部需求。鉴于此，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仍面对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未来可望维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发展前景应可看好。

科教文卫

航天探月量子通信智能驾舱齐亮相 “十二五”创新铸就“国之重器”

周琳 香港《大公报》2016年6月2日

6月1日，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开幕，展出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C919大飞机、“华龙一号”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高科技专项装备。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共部署2500余个项目，中央财政投入769亿元人民币（逾922亿港元），带动企业、地方和其他单位投入1080亿元人民币（近1300亿港元）。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是配合科技“三会”的重点展览，由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主办。采用大量现代科技，如虚拟现实、裸眼3D、全息技术等，实现“以科技展科技”。

现场展出的创新科技包括：量子通信（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新型通讯方式）、全超导托卡马克（利用磁约束来实现磁局限融合的环性容器）、中国极地考察等基础研究重大突破、C919大飞机驾驶舱、天宫一号模拟体验舱、北斗导航系统、高温气冷堆（用氦气作冷却剂的核反应堆）、深海潜水器、“天河二号”等战略高技术；以及集成电路、自主可控国产软硬件系统、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科技创新技术。

C919智能驾驶舱首揭面纱

科技部表示，“十二五”期间科技专项成果应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新增产值达1.4万亿元，出口额53.6亿美元，净利润额3600亿元。

展场内，尽管运20和C919两型大飞机只能以大模型方式登上展台，但中国商飞公司还是设立了智能驾驶舱，参观者可坐进舱内驾驶，感受多方位的摆动。大公报记者看到，驾驶舱内设计布局简洁，采用超宽超大触摸显示屏，通过触摸和语音控制和集成增强形态势感知技术，实现驾驶舱的智能控制。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介绍，该套系统是第一次展出，刚从北京实验室运来。它集成地空移动宽带通信等技术手段，实现驾驶舱的空地、空空信息互联。

高分四号创多项国际第一

巨大的、裹着金黄色铝箔的“高分一号”和“高分四号”卫星也是首次参展。

在2015年最后一次航天发射中，“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四号”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展区负责人介绍，“高分四号”创造了多个国际和国内的“第一”。与之前发射的“高分一号”、“高分二号”等低轨遥感卫星不同，“高分四号”运行于距离地面3.6万公里地球同步轨道上，仍能实现可见光50米、中波红外谱段500米的高分辨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分四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李果表示，这得益于“高分四号”采用的大口径面阵凝视相机，它是中国目前口径最大的面阵成像相机，一次能拍摄相当于河南省大小的国土面积。“它不仅代表了中国目前在高轨遥感卫星领域的最高成就，而且国际上也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同类卫星。”

深非遗文化传承者“武”进校园

朱开芝 曹焱炜 曾文静 《香港商报》2016年6月2日

日前，深圳龙城街道文体服务中心前往深圳信息学院就非遗文化的传承交流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其中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白眉拳倍受学生喜爱。

据了解，“白眉大侠”李汉明“隐居”在龙城街道爱联社区，他是白眉派第七代传人，也是社区舞麒麟队总教练。据统计，至今武术队已获得金牌100枚，银牌22

枚，铜牌19枚，集体金杯5个。在今年3月公布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三批区级非遗名录上，“爱联新屯白眉拳”榜上有名，填补了深圳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白。

此外，龙城街道文体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先前龙城街道就已经在弘扬传承非遗文化方面走在了前面，2013、2014年，李汉明带领的“白眉拳”、“舞麒麟”团队就已经进入多所小学校园为小朋友们展示以武术为表现形式的白眉拳和舞麒麟，将历史文化遗产精神的种子初步散开。本次活动作为“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再次落实了深圳“东进战略”部署，丰富街道辖区高校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让更多年轻一辈、更多群众了解更多的本土传统文化，也让白眉拳得到更广泛的传承与普及。

中国医改面临挑战：如何让医院患者都受益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6年6月5日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医疗体系提高竞争、增加就业并不是十分优先处理的问题，这可以理解，尽管这么做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到基于高技能服务的增长模式。如今的主要问题是，医疗成本能否控制在患者可承受、又足以维持医疗服务部门提供可持续服务的水平。中国目前的医疗改革已经暴露出这种尴尬。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是中国医改的重头戏，目前正在100个城市试点，并很快将推广到200个城市，目标是改革医院的运作模式，特别是成本/收入制度。重点放在禁止抬高药品价格、降低医疗检查成本，以及提高如外科手术等医疗服务的价格。这给各大医院实现收支平衡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政府补贴继续只占医院收入8%的情况下，一些医院员工显然对此心存疑虑。

然而与此同时患者却从这项改革中获益。几位中国专家的研究发现，厦门两所三级医院自2009年开始收支改革以来，不管是参加了医保还是未参加医保的病患，就医成本都有所下降。其他研究证实，就医成本降低主要由于药价下降。

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也在进行当中。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在推行一个计划，致力于降低数种治疗严重疾病的专利药物价格，该计划将减轻地方政府的议价负担。与此同时，中国70%左右的地市将试点分级诊疗制度，此举有望降低三级医院的服务需求压力。目前三级医院明显压力过大，它们可把一些病人转到层级较低医疗机构。

如今谁来承担医疗服务成本的问题凸显出来。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成本一直在升高，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高。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涨船高。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是

一方面控制病患就医成本，另一方面免除医疗机构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他们面临过度举债的困境；因此，医院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必须来自病患交费。

家境较为富裕的病患可能可以承受私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但这部分病人在就医病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约为10%。公立医疗体系仍然是承担医疗服务的主体，但系统内的医生收入明显过低。医疗服务能否既可持续又在病患承受范围内，还是说这只是两个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待这一轮医改提供答案。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试点成功，那么在今后中长期时间内，新一轮政策改革可能会把重点放在提升医疗系统的吸引力、汇聚高层次人才上。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安徽百万贫困户年内脱困 400万人建档立卡“一对一”精准扶贫

赵臣 香港《文汇报》2016年6月11日

安徽省近年通过精准扶贫一系列措施，今年将实现1,057个贫困村出列，96万贫困人口脱贫。今年是该省脱贫攻坚战的开局之年，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的方式，对各个贫困户的实际困难进行精准扶贫，同时，还将针对贫困户缺资金、贷款难等问题进行金融扶贫等。到2020年将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也将全部摘帽。

自2014年起，安徽省内开展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准确找到每一个贫困村和贫困户，将全省400多万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贫困类型、帮扶计划、脱贫评估等信息，都记录在《贫困户登记表》里，并录入扶贫网络信息系统。

与此同时，针对各个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实施的帮扶计划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据《贫困户登记表》的登记情况，安徽省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展产业、就业扶贫，对居住条件差的开展危房改造，对适合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展旅游扶贫，对因病致贫的开展医疗救助扶贫等方式，并将扶贫计划落实到责任人，实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精确扶贫。

将建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安徽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精准扶贫，安徽省将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明确规定省和重点市、县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部分的20%、非重点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部分的10%用于脱贫攻坚，并列入考核内容。据悉，安徽省金寨县便加大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力度，累计盘活资金1.5亿元（人民币，下同）重点用于精准扶贫。

该负责人介绍，安徽也将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例如设立小额扶贫信贷、扶贫再

贷款、政策性长期贷款、保费补助等，针对贫困户缺资金、贷款难的问题，还将继续推进金融扶贫，为授信贫困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的小额信贷，解决生产发展。

按安徽省的目标，到2018年，全省总体上将达到脱贫标准。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同时，贫困村年集体经济收入要力争达到5万元以上。届时，安徽省贫困县将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科技创新开辟粮食产业新路径

台湾“中央日报网路报”2016年6月16日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生产形势喜人，但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比如粮食加工浪费、秸秆焚烧等。这些老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粮食加工业普遍存在成品率低、食用率低、利用率低、效益低、产业链条短的“四低一短”问题，粮食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必须用科技创新抢占粮油加工制高点，提高粮食利用效率，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陈正行说。可喜的是，目前国内粮食行业探索的脚步正在加快。

推进绿色粮食产业发展

我国过度加工造成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据测算，小麦过度加工每年损失粮食约50亿斤，稻谷过度加工每年损失粮食70亿斤以上。谷物50%以上的营养附着在皮层和胚芽上，过度加工造成谷物营养严重流失。

倡导适度精准加工，发展全谷物加工、保全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正成为一种趋势。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王瑞元认为，大力推进绿色全谷物口粮工程，要把“适度、营养、健康、方便”作为发展方向，提高纯度，合理控制精度，提高出品率，保存原料中的固有营养成分。

今年5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倡导居民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250至400克。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全谷物写入国家膳食指南，有助于全谷物口粮工程的顺利推进。

“目前全谷物食品加工还处于起步阶段，粮食加工业面临很多技术难题。要加强技术研发，建立全谷物食品品质评价和品质改良体系，注重新技术在全谷物食品开发方面的应用，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研究谷物的适度加工。”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卞科说。

国家粮食局粮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谭斌多年来一直从事全谷物食品的研究开发，他们研发的苦荞挂面、高粱挂面、青稞挂面等杂粮产品系列，克服了传统杂粮不含面筋蛋白的技术难题，去年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糙米、速食糙米粥今年在江西、山东等地上市销售。“全谷物产业链的发展带动杂粮杂豆食品需求增加，带动边远地区、高寒地区农民种植杂粮杂豆。全谷物加工业有望成为粮食行业新的增长点。”谭斌说。

精深加工拓展市场空间

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粮食产业链条，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粮食资源利用率的又一重要途径。

以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生产可生物降解塑料，制作出的一次性纸杯、餐具等产品在使用后可堆肥降解，这是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淀粉改性技术生产出的产品。公司董事长张先炳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年产6万吨生物基材料，生产的生物材料可替代普通石化塑料而广泛应用于工业、医药、化妆、餐饮具等领域。

“目前国内粮食加工多停留在葡萄糖、氨基酸等附加值低的传统工业上，向新型环保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是未来的趋势，这样才能提高粮食附加值，带动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张先炳说。

在玉米深加工行业深耕多年的中粮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国君看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玉米深加工带来无限发展空间。用玉米加工成淀粉、酒精、果葡糖浆等初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1至2倍；加工成柠檬酸、赖氨酸等中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3至10倍；加工成酶制剂、苹果酸等高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10至20倍；加工成威兰胶、谷氨酸、黄原胶等更高级产品可提高附加值20倍以上。

“全球玉米深加工产品近4000种，我国玉米加工产品不到1000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我国应该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用工业化思维加快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岳国君说。

做好“秸秆经济”大文章

我国每年可生成9亿多吨秸秆，大量秸秆被弃置田间地头甚至一把火烧掉。现在随着科技研发水平的提升，发展“秸秆经济”，利用秸秆做肥料、饲料，生产人造板材、生物燃料、木质纤维素，可以提高秸秆附加值，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以各种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的无甲醛生态环保板材，可以满足装修、家具、地板、吸音板、写字板等生产需要，这是万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技术。公司工作人员龚茹告诉记者，该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供180多家家居企业使用。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绿色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生物质燃气运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已经建立起生物质工业化的完整产业链，可以利用稻壳、秸秆等做原料生产生物质燃气，代替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

纤维素燃料乙醇是我国近年来力推的生物质能源利用项目。秸秆中就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等天然高分子物质。中粮集团2014年研发成功的5万吨级的全套纤维素制乙醇技术，可将农作物秸秆中的五碳糖、六碳糖全部发酵转化，还开创了燃料乙醇、生物电的醇电联产模式，在生产燃料乙醇的同时，将很难利用的木质素用来发电，使秸秆得到充分利用。

“在推进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的同时，我们还在开发木质纤维素生产有机酸、氨基酸的技术，进一步提升秸秆附加值。”岳国君说。

丽江展开扶贫攻坚战

张兴明 金恒源《香港商报》2016年6月28日

当今中国，为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扶贫攻坚战，有着474万贫困人口的云南也是如此。作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云南省丽江市有着令人艳羡的旅游资源和发育良好的旅游市场。然而，光鲜背后有忧愁，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滞后、发展缓慢的经济社会等先天因素制约，使丽江仍然存在着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为了125万人的共同富裕，为了全面实现小康，丽江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整合各个方面资源，群策群力，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扶贫攻坚战，推动丽江经济、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易地扶贫搬迁改善环境

2015年9月的一场特大洪灾，导致丽江市华坪县中心镇田坪村全村14个组1548人受灾，造成4人遇难，4人失踪，民房倒塌13户、严重受损62户、一般受损130户。洪灾的发生，不仅让当地群众失去了住所，还致贫更深，田坪村成为了华坪县扶贫攻坚的目标之一。今年4月，记者来到田坪村一组一个位于半山坡的民居集中恢复重建点。只见30多户在建新房，每户建房占地约200平方米，统一规划建设为二层小楼房，水泥浇灌的屋顶，铝合金的门窗。民房间，施工队或打石作业、或基础开挖，一些村民也加入到了施工队伍当中，义务投工投劳，协助施工人员放线、丈量等，积极建设新家园，现场机声隆隆，人们来往穿梭，忙碌奔波。

在现场驻村扶贫的中心镇党委书记陈古量说：“田坪村、拉毕村是受灾最严重的两个地方，田坪村安排了一个集中安置点，拉毕村是两个。除集中安置点外，分散安

置点则是根据受灾户房屋的受损情况，分沿基重建、搬迁重建和修复加固3种方式安置。”

为帮扶受灾群众灾后重建，中心镇14位领导班子，123名干部职工全部参与灾后安置点的建设，所有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全部驻村睡工地，帮群众协调解决建房过程中的土地、水电、资金等问题。很多驻村扶贫的工作人员，自扶贫安置以来，不分白天黑夜的加班，只有春节才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和田坪村的部分民房受灾相比，位于永胜县期纳镇的半河村则整村受到泥石流的影响，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较差。全村101户344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去年扶贫安居近千户

期纳镇党委书记王素菊介绍：“半河村是典型的傈僳族聚居的村落，对半河村进行整村推进，易地扶贫，将他们搬迁到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生态环境优越的中所村进行安置，地质稳固，水电路通信建设方便，工程建设投入少，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的生存与发展 and 脱贫致富问题。”

距易地搬迁安置现场还有一段距离，记者就看到了整个工地上弥漫着飞扬的黄灰，施工队在忙着开挖地基，运输建材的车辆来去交错，一些进度快的地块上，建筑工人们在搭建钢结构，浇筑混凝土，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工地现场，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队员分布在各个在建的点上，不停地来回奔波着。

李贵华是半河村安置户之一，当天来到施工现场查看他的新房位置和工程进度，不时地帮工人搬砖运水。谈到新房年底完工时，他面露喜色：“我对政府的安置住房很满意，家里四口人，两个小孩在期纳镇上读书，每次小孩回家都要行8、9公里的路，路还不好走。现在从新房到学校，就只有2、3公里了。”

田坪村和半河村只是丽江千千万万实施了易地搬迁、安居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的冰山一角，记者现场到，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桥乡红桥村委会老街子村民小组、玉龙县黎明乡黎明村委会的海立子村民小组、华坪县通达乡维新村1组、永胜县仁和镇高寨村委会等的村落也正在同样的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东部，云南省西北部，是一个集“山区、民族、偏远、贫困”为一体的地级市。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6%，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57%。下辖1区4县中，宁蒗彝族自治县和永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是省级贫困县。

山区为主的地形，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也较多，扶贫首先直面的问题就是贫困山区群众的生存居住环境的改善。丽江将易地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与县域经济发展项目相结合，仅2015年，就实施易地扶贫开发850人，实施扶贫安居工程934户，预计建成安居房7.4万平方米。

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

路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6月2日

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从观念、制度入手。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政府、中介、买卖双方在长期的互动中累积制度建设知识。城市的国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场交易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知识。但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评估公司、金融机构、法院也不愿意为农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场服务。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

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有些农民希望将农村的房子卖掉，换取城里更好的住房，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价。城里人刚参加工作，一开始买不起大房子，先买个小房子，伴随收入的积累和房价的上涨，再拿小房子换取大房子。住房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农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是作为保障还是作为商品，应该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家家户户的情况不同，有的农户不需要宅基地作为保障，就不应该用政策来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试想下面的对话：”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换城里的房子。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为父母孩子治病，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农民说，我想卖宅基地，扩大生产致富。你说，不能换，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却要代农民理财，不是很荒唐吗？

部分学界人士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企业下乡，带去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企业下乡带去了技术、管理，和商业世界的知识。这些现代科技与商业知识正是农民所匮乏的。我调研过的河南土地流转案例，企业刚去农村流转土地时，村民比较朴实，要价比较低。但伴随与企业员工的接触增多，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知识，再转让土地时，农民学会了讨价还价，要价越

来越高。农民也在为下乡企业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技术、组织等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企业下乡，不是资本下乡，而是知识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我去过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我们发达，大公司比我们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我们富的多。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

城镇家庭幸福感高于农村 环境品质成衡量标尺

《香港商报》2016年6月25日

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成果昨日在北京发布，结果显示，2015年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76.89%，较2014年提高了0.5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幸福家庭比例为81.16%，高于农村家庭的73.25%。此外，环境品质成了衡量内地居民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标尺。调查显示，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居民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居民幸福感随着总体环境评分的提高而增长。

家庭幸福感高于个人

据了解，调查项目由中国人口宣教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实施，此次是自2011年连续进行的第5次调查。据介绍，国人的家庭幸福感分值为6.60分，明显高过个人幸福感，即6.41分。

专家表示，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受访者的家庭幸福感得分都要高于个人幸福感。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家本位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个人幸福感与家庭幸福感紧密相连，离开了家庭的幸福，个体幸福犹如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调查显示，女性、年龄更长、健康良好、非农户籍、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初婚有配偶的人群更幸福。

健康与幸福感密切相关

调查表明，健康与幸福感紧密相关，心理健康状态更好的人会更多地希望和家人在一起，更相信国家和家庭在提升幸福感方面的作用。超过40%的受访者将“家人健康”作为决定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基础，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家人健康”是决定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最重要的4个因素之一。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姚宏文介绍，环境品质已成为衡量居民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标尺，家庭幸福感会随着环境参与度的提高而增加，参与环保行为也会提高居民家庭幸福感。同时，对政府治理污染认可度越高的民众，家庭幸福感越高；反之，则家庭幸福感较低。

食安问题威胁幸福感

调查还说，食品安全正在威胁民众的家庭幸福感。超过3成的调查对象有买到不安全食品的经验。由于缺乏高效快捷的问题处理方式，大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沉默应对。基于本次调查所反映的问题，姚宏文建议，实施积极的家庭发展战略，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推进教育、劳动就业和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改善食品安全的社会环境。

除了食安问题，住房等民生问题也是观察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结果显示，53.4%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提高2.6个百分点，43.4%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可以接受”，3.2%的居民认为“令人满意”。报告还显示，未来3个月内准备出手购买住房的居民占比为15.1%，较上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

勿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扼住中国创新

高西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6月7日

在中国，知识产权被过分强调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从数量和形式的角度，是被过度地强调了，但实质却不是这样。政府在不断地强调并且鼓励人们进行创新，打造创新型国家。同时又有很多人说，尽管如此，如果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那么人民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鼓励人民创造发明和依法治国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们必须要有个全方位一体化的视角，要考虑我们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什么，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道德价值的维度，一个是功利主义的维度。在我看来，功利主义的维度更强一些，也就是说这主要不是各国政府的

价值主张。说是为了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来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事实上，则常常是为了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或是自己的先行者垄断权。

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创新体系？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想要推进创新的发展，使人们愿意加入其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创新、创业。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需要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保护知识产权呢？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导致生产成本升高，经济下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就会有很多人反对保护知识产权，或者嘴上说保护，实际上不保护。但如果我们发现由于全社会的创新性不够，经济发展开始受到负面影响，工厂只能生产低端产品而导致利润微薄，工人努力工作也不能产生价值，加上外部世界对我们抄袭产品的抵制和谴责的话，人民和政府就会产生共识：即如不保护知识产权就会伤害到所有人的利益，就会阻碍社会前行；如果没有法治社会，人民就不愿意创新；没有可以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系统、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的体系，社会的进步就会逐步停滞。

1978年、1979年左右，我还在中国的法学院上学，当时我们围绕着中国是否要制订专利法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当时我曾亲身参加过多次的讨论会议，听到支持为保护专利而进行立法的强大的声音。但是还有更强大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有专利法，因为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需要利用西方人开发的技术来发展。他们认为在此之前的许多年，西方人侵略、剥削中国，现在他们的技术水平处在中国前面，他们就想保护他们由于技术垄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他们已经在大巴上，就急着关门，不希望我们踏上这个快速发展的大巴。所以专利法的制订被压了好几年。现在全球化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中国的经济确实对于世界经济的依赖与日俱增，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中国的领导层和人民都逐渐认识到，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符合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最终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个不同的命题，即开始时是功利目的，后来逐渐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

现在中国讲创新、创业，很多人意识到是顶层的态度，在从顶层驱动。中国人是十分勤奋的群体，老百姓非常聪明，应该是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现在为什么我们创新不行了？我们好像更加擅长于关注一些小的细节，细致入微地制作东西，抄袭、拷贝，通过逆向工程进行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复制。但这样做已经快要到头了，因为我们和别人的差距已经大大缩短，别人不会容忍我们再大规模地这样做了，我们自己也不再满足于跟在别人后面模仿，而要走出自己的路子了。我们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顶层的设计，取决于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正像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讲过的，政府如果对法律没有

敬畏心，则人民的发明创造精神一定不会得到发扬光大。

综合治理

粤环保治理引进社会力量

黄裕勇《香港商报》2016年6月10日

为了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促进广东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按照“谁污染、谁破坏，谁付费”原则，广东省在环保治理方面将坚持市场化运作，引进社会力量开展污染治理。政府将创新投资运营机制，建立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环保治理，广东省将对可经营性好的环境公用设施采取特许经营、委托运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在环境治理项目，广东省鼓励这些环境公用设施项目优先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府可采用股权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补助、财政奖励、融资费用补贴、政府付费等方式参与项目建设。

对于已建成及在建环保基础设施中引入社会资本，广东省将通过项目租赁、重组、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对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城镇污染场地治理和区域性环境整治等，采用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鼓励各地政府引入环境服务公司开展综合环境服务。

具体而言，广东省将实行差别价费政策，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并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实行差别化排污收费。

针对城市污水垃圾处理成本，广东省将完善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政策，适当提高收费标准，逐步覆盖全处理成本。

中国反腐运动扩大范围

米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6月24日

中纪委宣布将对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等3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今年已处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16545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范围扩大，反腐调查人员正准备对中国财政部和外交部等等部门进行更多巡视。在习近平为明年的领导换届做准备的同时，反腐运动进入最新阶段，在这场运动中，党内高官周永康等身居高位的“老虎”、数十万级别

较低的干部以及商界高管纷纷落网。

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打击腐败的中纪委本周宣布，将对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等3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中纪委表示，今年迄今，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处罚上升了60%，处理16545人。

习近平的反铺张浪费之战，以及对贪腐的高级官员的高调起诉，是其掌权的4年的一个关键特征。

由王岐山领导的反腐运动扩大了范围，中纪委和警方对在国外寻求避难的嫌疑人进行追剿。周三晚上，中纪委宣布其反腐追逃的“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唐东玫从澳大利亚回国自首，自愿接受审判。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对副部级或更高级别的“老虎”和级别较低的“苍蝇”的起诉一直在高速进行，今年也延续这一势头。网站ChinaFile维护的在线贪腐追踪器显示，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纪委对6只“老虎”和120只“苍蝇”发起了新的调查。

然而，今年对“老虎”的调查所涉及重量级高官变少了，原因是在明年的换届前，习近平和王岐山强调党内团结和忠诚。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中国分析师邓丽嘉(Erica Downs)表示：“对高调的个人进行追查以强调党纪的做法发生了改变。反腐运动有多重目的，近来加强对党的控制似乎成为了一个重要得多的目的。”

明年年底的中共十九大将见证一大批高级党政职位在习近平的第二个5年任期前进行人员变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习近平的整体目标是（明年）党代会上的人员组成。反腐运动是一个恐吓对手的有用工具。”

一些将成为此次新一轮巡视对象的党政机构是第二次接受调查。王岐山表示：“巡视组既要检查上次巡视整改落实情况，也要发现新的问题。”

反腐运动迄今捉捕的最高层人物周永康在2014年被捕，并在去年被正式定罪。曾经主管中国能源部门的周永康，是中共最高机关政治局常委会中第一个因贪腐受到起诉的委员。

近几个月，周永康的一些盟友和家庭成员也在后续的案件中被定罪。

反腐运动中许多最受人关注的案件是被巡视组查出的，这些小组由中纪委人员和负责人事任命的中共组织部人员组成。自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对中央党政机关、省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启动了10轮巡视。根据欧亚集团的报告，以当前的巡视速率，“在2017年的党代会之前，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最重要的央企和所有省级政府都将至少被反腐调查一次”。

结构性改革是提高亚洲潜在增长率的关键

赫苏斯·费利佩 魏尚进 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6月15日

2015年，亚太地区依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占全球增长的60%。亚洲在全球经济产出表现平平的形势下展现了其实力。然而，面临巨大的全球阻力，亚太地区必须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新的亚行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坚定的改革举措，亚洲许多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潜在增长率指的是在不加快改革步伐的前提下，在充分就业和通胀稳定情况下所能实现的最大经济产出。

承认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带来的挑战为什么会有所帮助呢？一方面，如果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利用货币和财政激励政策来提高实际增长率、使其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举措是适宜的。另一方面，如果二者已经持平或接近，那么比起采取货币或财政激励政策，更应该优先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增长潜力。

造成亚洲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来自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与2000年—2007年相比，2008—2014年间，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以上，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亚洲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出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还有韩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和泰国。当然，这次增长放缓的程度和影响都远不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已经告别了保持高增长率的“昔日辉煌”。通过将低工资水平与增长导向型政策相结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已跻身增长最快的国家。印度启动了宏伟的结构性改革计划，目前已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为什么一些亚洲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结构：该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阶段。以中国为例，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在萎缩。即使在劳动人口正增长的国家，其目前的增长率也往往低于以往水平。

其次，物质资本积累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在一些国家，这种积累已经开始显出颓势。再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增长放缓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扩散到了亚洲其他地区。

人口结构的改变非朝夕之功。虽然中国在近期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一户一孩变为一户两孩，但此举对于今后的十五年并无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哪个家庭能立刻生出一个劳动年龄的孩子。因此，至少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劳动人口下降的速度不会受

政策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新生人口的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不过，亚洲国家可通过实行改革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亚洲，农业就业人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许多国家超过了30%），要加快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实施促进生产要素高效分配的改革至关重要，比如对中国限制人口内部流动的户籍制度加以改革。

在教育、贸易、金融资本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政策效能等领域深化改革有利于提高增长水平，并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效分配。优先进行哪些该改革则因国家而异。

很多此类改革面临着政治挑战。但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只要付诸实施，这些改革将显著刺激增长。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和降低贸易壁垒都是成功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越南自1986年实施的“革新开放”（Doi Moi），其内容包括开放国际贸易，下放决策权，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扩大私有化。近期的例子则包括：2015年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取消燃料补贴，以及印度于本月刚刚通过新破产法。

我们预测，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实施上述领域的改革，那么在未来十年，其潜在增长率将可提高近一个百分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亚洲绝不可因此而自满。继续推进结构改革将提升亚洲增长潜力，确保亚洲在全球增长和减贫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脆弱的台湾公民社会

柳金财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6年6月27日

台湾因公民记者洪素珠怒骂退休老兵案，引来两岸社会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台湾社会没有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认同道歉；并表明要谴责任何仇恨言论，停止散布任何族群偏见。此正凸显隐藏在台湾政党轮替背后的问题，长期以来族群、省籍及统独问题若无法真正有效化解，势将冲击台湾公民社会建构，不利于台湾政治民主化发展。

洪案经媒体不断宣传，已引来台湾不分政党、公众的谴责与挞伐。同时，在大陆引起广泛关注热议与批判，包括央视、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大陆央视四套甚至以“恶毒言行”形容洪女行径，有违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平衡性及公正性。

事后洪素珠背后的组织“台湾民政府”在官网两度发表声明，强调洪女行为与其无关。一、对于新闻报道，基于新闻媒体自由的坚持与专业的尊重，对其采访内容及

方式没有任何看法；二、认为其发言确实有不妥善的地方，应该自己要出面修正。此显示即使其隶属组织亦不认同这般撕裂社会的言语霸凌与非文明行径。

洪女自称公民记者，以极为挑衅及情绪性的字眼，批评老荣民辱骂“为什么要台湾养你？”“来这里啃台湾人的骨”，台湾社会无法再养这批“中国难民”，怒骂嘲讽要老兵“滚回祖国”去。这种偏狭族群意识极为容易演变台湾人/中国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二元结构对抗，撕裂社会连带意识及台湾命运共同感。

事后洪女受访时宣称，因为老荣民先骂她是搞台独。这事件虽属单纯偶发个案，但某种程度上适足以反映极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极端台湾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独立与统一主张是对立并存现象，其背后潜藏着族群意识、省籍身分及统独诉求的冲突，彼此欠缺接纳性与包容性。

事件不仅显示台湾多元族群平等教育有待提升，也凸显真正且健康的公民社会建构有其迫切性。首先，多元族群平等教育问题：台湾是多元族群平等社会，传统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原住民族及随国民党政府来台大陆人的分类，已不太完全适用。尤其是族群间通婚普遍，混淆族群间鲜明区别，任何人不能因其族群身分而受歧视性待遇。

洪案只是台湾社会冰山一角，潜藏在社会中族群、省籍、世代分配正义等问题盘根错节，成为潜在冲突的根源。蔡政府在推动台湾社会“转型正义”之时，若强行推动一系列“去中国化”或“文化台独”运动，或将激化族群、省籍及统独对立，毫无助于被撕裂的台湾社会和解。

其次，现代公民素质培养问题：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守法重纪社会，在公民社会中应给予多元族群平等对待，建立起法制和包容的文化。任何人作为公民身分，都应受到最起码的尊重与享有基本权利；不应因其本身族群意识及身分认同，而受到歧视性待遇；族群仇恨与歧视性语言霸凌在任何场合皆不应出现。公民新闻与批评一旦逾越道德与法律界线，就应接受道德约束与法律制裁。洪女运用“公民记者”身分，宣扬偏激极端的族群意识、省籍身分及国族认同，只会制造不同族群的撕裂与对立冲突；毫无助于和谐互助、自治自律、权利义务相对称的成熟公民社会建构。这种行径超出传统蓝绿政党政治对抗所能容许的范畴，滥用媒体第四权监督角色，恣意扭曲言论自由尺度，严重伤害公民社会对公民权的保障。

最后，和谐友善社会问题：国际人士及大陆民众对台湾保存深厚中华文化特色印象深刻，认为台湾是中华文化继承者、维护者与保存者。台湾人民性情温和友善、忠厚包容、温文尔雅、富而好礼，台湾最美风景是人。然此事件却可能颠覆既存良好形象，极端个别民众的激进言行易被传媒放大，可能重创台湾社会和谐形象，不利友善社会建构。

台湾社会富藏传统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在现代公民社会中这是一项社会资本及无形资产，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充满互助及关怀。许多大陆人士来台短期交流后，反而认为台湾社会因保存中华文化，更像传统中国社会，在台湾找到中华文化的保存创新与生命力。这种文化的软实力，是两岸和谐社会建构及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与元素。

我们在批判洪案事件之余，也需深深地彻底反思，究竟台湾社会从走出国民党威权统治及经第三次政党轮替后，迈向一个真正且健康的公民社会，尚有多远距离？台湾社会能否真正学会包容、欣赏和尊重不同族群的差异，这不仅仅包括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大陆外省籍人士及其第二、三代；也涵盖来自东南亚配偶、新台湾之子。对蔡英文政府而言，如何能够跨越党派利益之争、缩小不同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及尊重多元族群平等、融合，把一个断裂社会重新团结起来，共同打造一个相互尊重、欣赏差异、包容和解的多元社会，正是刻不容缓的首要治理转型正义课题。

学术前沿

解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这一计划的发布可以说是这个土壤修复事业的里程碑事件，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全面战略部署。本期我们搜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土十条”的出台意义重大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战峰**：一方面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土壤保护的殷切期待，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土壤保护的高度重视，坚决向土壤污染宣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体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整体上还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土壤方面也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突出，局部地区更加严重。“土十条”的出台，是对国家环境保护要求的回应。”同时，我国土壤环保工作很多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距离土壤环境保护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这次‘土十条’的出台对土壤环境保护有着统筹谋划的意义，对我们将来中长期的土壤保护的目标、重点、任务、机制保障、能力等等，都有系统的规划、系统的谋划。”董战峰表示，“土十条”的出台对国家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中长期路线图，为国家下一步更好地推进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顶层设计。（中国网 2016年6月21日）

土壤治理需有的放矢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生态部主任**王夏晖**：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通常可分调查评估、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验收等阶段。具体方法一般包括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3类，有时需要综合运用。

“土十条”明晰，按污染程度将农用地划为三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以耕地为重点，分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样的治理思路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滞后性等特点不无关系。与大气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研究才能确定。而且，土壤中重金属难以降解，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较长时间才能降解。土壤污染防治应“预防为主、风险管控、切断来源、协同治理”。其中，预防为主是必须坚持的优先策略。（新华网 2016年6月2日）

土壤修复技术不成熟资金缺口大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目前技术不够成熟，储备还不够”，“土十条”提出，土壤修复技术和设备研发要继续加大投入，加强储备。土壤污染个性特点多，不像水和大气污染共性多。土壤修复技术也不像工业产品那么标准，北京、湖南能用的修复技术，广东不一定能用。土壤修复要根据当地的污染情况调查，然后做风险评估和修复方案。这里面技术要求很强，工艺很多。据了解，目前国内仅有有限的土壤修复科研单位的技术相对有效和成本合理。国家防治先行示范区韶关在修复上投入不少，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修复技术。（新浪网 2016年6月1日）

重污染耕地可退耕还林 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会长、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周顺桂**：土壤修复做下来比水气难很多，目前土壤污染还是风险管控为主，没有明确说要治理修复多少土地。由于修复技术不成熟，此次“土十条”农用地管控要求未提修复。其中对轻中度污染的土壤，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重度污染土壤，严格管控其用途，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严禁种植食用农产品；制定实施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计划。

而对城市工业地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上述企业用地，“土十条”规定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已经收回的，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负责开展调查评估。根据调查评估结果，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合理确定土地用途。（新浪网 2016年6月1日）

“土十条”成为我国土壤治理重要依据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会委员**冯嘉**：此次“土十条”提出“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等10条内容共35项任务。明确了“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因为我国还没有任何的法律来保护土壤方面的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在土壤管理方面基本是处于空白状态，所以“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我国在土壤防治方面管理依据的角色。“土十条”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中国网 2016 年 6 月 21 日）

农用地分类管理具体如何实施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战峰**：首先是划定土壤环境质量类别。需要加快制定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在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基础上进行评估，推进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并建立分类清单。二是各地方可以通过对本行政区域内优先保护类耕地面积减少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的县市区采取预警、限批等措施，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也要严格控制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等重点行业，防控企业污染。三是对于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的县（市、区）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四是实施严格管控，加强对严格管控类耕地的用途管理，如对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严禁种植食用农产品，将严格管控类耕地纳入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实施范围，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等。五是要加强林地、草地、园地的土壤环境管理，严格控制农药使用量，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等，加强对重度污染林地、园地产出食用农（林）产品质量检测，超标则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第一财经日报》2016 年 6 月 1 日）

“土十条”给农业和农民带来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部分污染土地可能需要暂时休耕修复，要把“隐形的利”和“长期的利”结合起来。长期而言，这些限制性措施有利于农业持续发展，这也符合“藏粮于地”的要求。根据“土十条”，2017 年底前，国家将出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指南。到 2020 年，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的面积达到 4000 万亩。

控制农业污染，也是对农民生产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把各类补贴和化肥使用、农膜使用的规范挂钩，引导与约束相结合，控制发生在农业生产中的土地污染出现。工业项目一定要向园区集中，实现空间隔离，远离农业产区。“特别是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要实行最严格的环评审核准入，控制污染项目落地。”（《西安日报》2016 年 6 月 2 日）

解读“高考改革”

随着湖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日前公布，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4 个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出炉。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社会极其关注。本期我们搜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高考改革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改革是大势所趋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已经不能很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现实需求，改革是大势所趋，让学生的选择性更多，高校的自主性更强，这是改革的目的。根据国家的方案，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分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 5 个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长江网 2016 年 4 月 23 日）

改革有利于高校招录到优质生源 辽宁大学副教授**姜海峰**：根据国家要求，未来高考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取消批次后，考生心理上不再有一本、二本、三本的界限和障碍，所有高校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招生，更有利于高校的优质专业招录到优质生源。（《中国教育报》2016 年 6 月 30 日）

改革促进高校公平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兰娟**：实施综合评价录取，可扭转“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广为诟病的问题，通过采取“高考成绩+面试成绩+学业考成绩”录取方式，促进高校公平、科学选材。（新浪网 2016 年 6 月 30 日）

改革后奖励加分会减少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志愿先考虑专业再考虑学校，是招生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高校本科分为三批，这个都是人为的，是我们考试招生机构为了录取的方便，把学校就分成三批来录取。这个对考生来说，并不一定是很公平的。二本它有的专业比一本好，新的高考的办法是先报专业，再报学校，那这样的话本身都打破了批次的概念。今后的加分政策简单概括就是，“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奖励性的那些加分会越来越来减少，譬如说艺术加分、体育特长加分，现在慢慢都没有了。因为这种要求对农村地区不太公平，他们缺乏条件。但是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性加分还是保留了，比如对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的加分，这是一种需要去特殊关照的群体。（吕梁网 2016 年 6 月 9 日）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教育的公平分配 中国教育政策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我国现行的高考政策和高考制度，基本上是沿袭计划经济体的做法。这个做法主要的出发点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很难考虑到个人的需要。总体来说，高考关系到上大学的这样一个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必须要体现社会公平。除了能力和分数之外，户口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考生，因为各个省在分配上大学的名额方面，

是不完全一样的，会造成不平衡。所以，异地高考就是要把户口这一要素，从受教育机会分配当中拿开。通过这样一个做法，来体现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实际上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说这场改革在各地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因素影响他们，以至于要做更慎重的考虑，逐步来达到目标。（央广网 2016年5月9日）

应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 上海师范大学附中校长**严一平**：改革使考生关注的焦点，将由高校的“大门”转为专业的“小门”，未来应引导考生更多关注自己的志趣专长和进入高校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根本改变考生录取的学校和专业“学非所长”和“学非所趣”的不对称现象。在这样的改革方式下，很多考生会对各院校专业排名比较关心，目前社会上已有很多机构对专业排名进行评估。为保证排名参考的科学性，应引入国际先进的专业排名模式，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提供给考生和家长作为参考。（搜狐教育 2016年6月30日）

信息快递

国退民进破增长困局 香港《信报》6月17日报道，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首季出现昙花一现的繁荣，但踏入第二季全面增长减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由3月的10.5%降至5月的10%；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至5月下降至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3月达到一年的高位的6.8%，但没有进一步向上而是回落到6%。过去多年来社会上不断发出国退民进呼声，但两三年间已经没有人再提了，尤其是现届政府提出国企改革，并试行混合所有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让利于民，而是为了改变国企管治效率。中央的心态仍希望将国企做大做强，但国企在官僚制度下，无论如何改革亦不可能达到民企的效率。目前政府政策以至银行信贷资源均全面倾向这些低效的国企，民企得到的助力不足，难以发挥推动经济的作用。所以要成功推动民企的转型升级，中央或先要从国退民进方面入手，为民企制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反腐并未拖累经济 美国“侨报网”6月14日报道，美国彭博社将中国各省反腐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比较，并以海南、广东等省份举例证明，反腐并未拖累经济。彭博行业研究整理了一组包括各省官员腐败案件数量、省级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的独特数据，分析这组数据可得出三个结论，一是腐败调查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放缓，一个特定省区被查处官员的数量与其增长速度之间没有系统性关联；二是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高级官员贪污问题更严重的省份增长速度低于而非高于平均水平；三是腐败的根源在于国有部门过大，以及靠地方政府举债推动经济增长。彭博社认为，国有化程度最高、举债最高的省份腐败问题更严重，这表明即使反腐败调查者试图打

击各处冒头的贪腐，但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则是国有部门的改革，以及对地方政府举债更强有力的控制，否则腐败的源头将堵之不尽。

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即将达标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6月11日报道，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中的第一步是实现跨境贸易结算，第二步是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则是成为储备货币。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取得了60多项成果。金融合作是本次对话的一大亮点，也取得最耀眼成果：双方将加强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合作，中方同意给予美方2500亿元人民币（516亿新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并指定中美各一家符合条件的银行作为人民币清算行。根据香港金融界人士的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美国，不仅是“中美两国金融合作迈出新步伐”，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即将全面实现，提早达标的重要一步。

中国推新政整治污染 台湾《经济日报》6月15日报道，中国环保部公布《水污染防治法修订方案》，最令外界瞩目的是，这次修改将违法行为处罚上限设定为人民币100万元，可见整治水污染的决心。百达投资顾问指出，水资源的问题简单区分为质与量，从品质来看，中国环保意识抬头，官方的大动作说明全球水资源问题已到不得不采取行动的阶段，有利于处理水品质的水科技公司发展；从数量来看，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方式的变迁，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用水需求已经增加了9倍，但依现阶段的技术，人类所能使用地球上的淡水却只有0.025%。新兴市场相关资本支出提高，成为这方面的增长动能的来源，有利于水务公用事业发展。KBI全球水资源基金经理人莱恩预期，新兴市场或成熟市场未来都将投入大量资金在水资源基础建设。

机器人产业恐步新能源车后尘 台湾《工商时报》6月16日报道，中国政府把机器人产业列为十三五计划、中国制造2025政策发展重点之一，但业界人士指出，因为企业靠着诈骗行为和非法关系取得地方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形很普遍，整个行业就是靠补贴吹起的大泡沫。中国工信部资料显示，包括制造和服务工业机器人，中国机器人公司数从几年前的数百家激增至3400家以上。去年就有36个城市把机器人产业列为重点发展项目，推出税收减免、信贷、技术等优惠政策。不过中国机器人网执行总裁赵勇估计，中国的机器人公司不是赔钱就是勉强打平，2015年中国共卖出工业机器人140亿元，85%是进口；业界推算平均每家机器人公司年营收还不到10万人民币。

粤自贸区首创容错机制 《香港商报》6月4日报道，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与国内其他几个自贸区同类条例相比，广东的条例主要有两大亮点：专设粤港澳合作章节和首创“容错”机制。广东自贸区条例在先行先试中建立容错机制，属国内首创。条例将容错免责具体化、条件

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务实法律条款，为在广东自贸区开展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

《条例》的另一亮点是为突出粤港澳合作和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专设了粤港澳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条款，内容包括促进粤港澳人才流动、支持三地青年创新创业、深化对港澳服务业的开放、创新粤港澳口岸通关便利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建立面向“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综合服务平台、开发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等。

中国应尽快处理企业债 《香港商报》6月12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呼吁中国，要尽快处理日益严重的企业债务问题，警告有朝一日或会成为系统性问题，可能同时拖慢中国经济增长及引发银行业危机。国基会的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深圳一个会议上发言，指中国企业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5%，比率非常高，而国有企业就占了当中的五成半债务，但他们只为经济产出贡献两成二。利普顿认为，如果中国要避免重复信贷增长、负债及企业重组的循环，就需要汲取教训，改善企业管治。人行上周在年中工作报告亦指出，政府推动降低债务及去产能的措施，可能会增加债务违约风险，并令企业融资更困难。

中国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新低 日本日经中文网6月13日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3日发布的5月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显示，1~5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增速较1~4月回落0.9个百分点。自2000年以来时隔16年增速首次跌破10%。公共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表现坚挺，不过民间投资的增速出现下滑。投资增速出现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表现低迷。中国领导层正在推进淘汰钢铁和煤炭过剩产能，因此生产低迷可能走向长期化。

完善政策促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 《澳门日报》6月1日报道，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中国传统汽车市场增速持续放缓，首季汽车产量及销量按年增幅分别为6.2%及6%，但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爆发性增长，同期产量与销量为6.27万辆和5.81万辆，按年增达1.1倍及1倍。2010年国家推出一些列财政补贴与利好政策，但在高额补贴及尚待完善的监督机制下直接催生许多骗补者，有些新能源企业为获得补贴而造假的丑闻也相继曝光，令新能源汽车市场也遭受打击。但从今年1月开始，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清查。国务院也把遏制骗补行为作为重点督查问题，在今年两会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相关负责人都明确指出会严肃处理骗补事件，未来将出台更多市场化的鼓励措施，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法律法规也将更完善。预计新能源汽车在下半年将迎来大量增长，在第四季达历史高点。

内地房屋去库存初见成效 香港《文汇报》6月9日报道，交通银行最新一期的《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显示，受3月底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地产政策调整

影响，多套房家庭的购房意愿受到抑制。其中，拥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小康家庭当期不动产投资和未来不动产投资意愿分别下降7个和8个百分点，但首次置业或改善型家庭的购房意愿并未受到影响，本期0-1套房产家庭的未来不动产投资意愿甚至还上升了8个百分点。分城市级别来看，核心城市家庭当期不动产投资回升2个百分点，未来入市意愿下降3个百分点，受当期和未来投资意愿综合影响，本期核心城市家庭不动产投资意愿与上期持平，非核心城市家庭在当期和未来不动产投资意愿双升的带动下，显著上升了5个百分点，与当前二三线城市不动产市场上升的现状较为契合，说明“去库存”政策逐渐显效。

京建“黑名单”严打非法一日游 香港《大公报》6月7日报道，针对北京存在的非法“一日游”问题，北京市旅游委召开旅游市场秩序和端午节工作部署会议，旅游委负责人赵广朝介绍，北京将加强对“一日游”景区周边购物场所的监管力度，建立“黑名单”公示机制。赵广朝表示，今年来，北京各区对旅游市场治理高度重视，截至5月底，全市各部门、各区针对旅游市场共开展专项检查1900余次，查处黑导游30人，责令停业整顿7家购物店，停机处置116个通信号码，行政拘留870人，治拘780人，刑拘4人。赵广朝建议，完善旅游联合执法办案机制，工商部门要依法查处商业贿赂和虚假违法广告，特别是加强对“一日游”景区周边购物场所的监管力度，建立“黑名单”公示机制。

专家建议启动破产法修改工作 英国路透中文网6月2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称，《企业破产法》实施已满九年，现在启动破产法修改工作、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已成为迫切需要。李曙光建议从五个方面入手启动破产法修改工作，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第一设立金融机构破产专章，规定金融机构破产各方面的特殊问题；第二扩大破产法适用范围，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第三构建专门的破产法庭，取消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权利，改由债权人会议任免，由人民法院认可；第四设立破产管理局，由其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一个政府部门来负责推动破产法的实施，管理破产方面的行政事务；第五在《破产法》重整一章中增加重整前程序，即庭外重组和预重整的相关规则，允许债务人以自愿重组为目的进行庭外谈判。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85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6年7月28日